DOI:10.19789/j.1004-9398.2023.06.012
文献引用:胡晓,陈宗颜.青海河湟谷地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特征[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3,44(6):83-91. HU X,CHEN Z Y.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oponymic cultural landscape in Hehuang Valley of Qinghai Province[J].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Edition),2023,44(6):83-91.

青海河湟谷地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特征*

胡 晓,陈宗颜**

(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8;青藏高原地表过程与生态保育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青海 西宁 810008)

摘要:地名是群体共有的精神记忆,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对中华优秀传统文脉的延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采用分类统计法、核密度分析法和标准差椭圆分析河湟谷地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显示:(1)河湟谷地地名可以分为自然景观类、人文景观类和其他类3个大类;(2)河湟谷地地名呈现以西宁市为中心,沿湟水、黄河和大通河等水系向周围辐散降低的方向性趋势;(3)自然景观类地名充分体现了河湟谷地先民们依山傍水、趋利避害的自然选择,折射出粗犷、朴直的自然环境;(4)人文景观类地名反映了河湟谷地多民族融合发展及地处边地要塞的特征。本文可为河湟谷地的多民族融合发展、历史人口迁移和文化传承等研究提供地名文化依据。

关键词:地名;文化景观;河湟谷地;核密度分析;标准差椭圆
中图分类号:K901.6 **文献标识码**:A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oponymic cultural landscape in Hehuang Valley of Qinghai Province*

HU Xiao, CHEN Zongyan**

(1. College of Geography Science,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Xining Qinghai 810008;
2. Key Laboratory of Tibetan Plateau Land Surface Processes and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Xining Qinghai 810008)

Abstract: Toponym, as the spiritual memory shared by the residents, carries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ontex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oponyms in Hehuang Valley by means of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classification statistics,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The results show: (1) geographical names of Hehuang Valle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natural landscape, human landscape and others). (2) The names of Hehuang Valley show a directional trend of the divergence of Huangshui River, Yellow River, Datong River and other water systems with Xining as the center. (3) The toponyms of natural landscape fully embodies the ancestors' wisdom in living near the rivers and trying to avoid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landscapes for

收稿日期:2022-12-13
* 青海省创新平台建设专项(2020-ZJ-Y06);《地貌学》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项目(校级);《地貌学》课程思政示范课建设项目(校级)
** 通信作者:chzyqh@163.com

their residence in Hehuang Valley, and reflects the rough natural environment. (4) The toponyms of human landscape show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ulti-ethnic group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litary and communication areas in the Hehuang Valley. This paper can provide some useful information of the toponyms for the study of multi-ethnic integration,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in Hehuang Valley.

Keywords: toponymy; cultural landscape; Hehuang Valley;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CLC: K901.6 **DC**: A

0 引 言

地名是认识一个空间地域的最初印象,蕴藏着该区域丰富的自然和人文信息,饱含着人们认识、改造和适应自然的过程,保存着人们生产、生活的历史记忆。地名文化是具有综合性的文化,兼顾了语言学、历史学和地理学等方面的信息,具有社会性、地域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等特点,研究历史悠久。

20世纪90年代起,国外学者综合现代地理信息技术和新的数理统计方法,对地名的命名、发展演变和空间分布等展开研究,Yeoh[1]分析了新加坡社会政治条件对地名的影响;Jett[2]分析了亚利桑那州切利峡谷的纳瓦霍地名及其环境;Capra等[3]以撒丁岛为例调查了地名的含义和分布;Cavallaro等[4]归纳了新加坡城市地名的发展及特征;Gill[5]、Nadezhda和Thomas[6]系统研究了莫斯科和鄂温克族地名的时空演变。在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区域地名文化、地名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及地名演变特征[7],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空间分析技术与数理统计方法来探索地名文化成为研究热点,如利用GIS技术建立广东地名元数据库[8],采用经验正交函数[9]、空间平滑法[10]、多元回归分析[11]、地理探测器和史学地图对比分析[12]等研究方法;从研究区域看,研究华北地区和华南地区的居多[8-12],也包括广东的荔湾区[13]、北京的房山区[14]等小区域,甚至聚焦于某一自然区域,如滇池[15]和阿克苏流域附近[16],并开始向少数民族聚居区侧重,研究包含了壮语[11]、藏语[17]和客家话[18]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化。

我国地名文化的研究重心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地名文化研究相对较少,西部多民族融合区的研究更为罕见。因此本研究选择西部农业发达、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融合的河湟谷地为研究区,利用分类统计、GIS核密度分析和标准差椭圆法等,分析河湟谷地的地名文化及其空间分布特征,挖掘多民族融合发展的河湟谷地的地名成因,以期为研究该地区的多民族文化融合发展以及历史人口迁移等研究提供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河湟谷地(35°~38°N, 100°~103°E)位于青海省东北部(图1),其行政区划由1989年中国科学院黄土高原综合考察队界定[19-20],包括湟水流域的西宁市市辖5个区及大通县、湟源县、民和县、乐都区、平安区、互助县,黄河流域的循化县、化隆县、同仁县、尖扎县、贵德县和大通河流域的门源县,是青海省重要的农业耕作区和政治、经济与文化集中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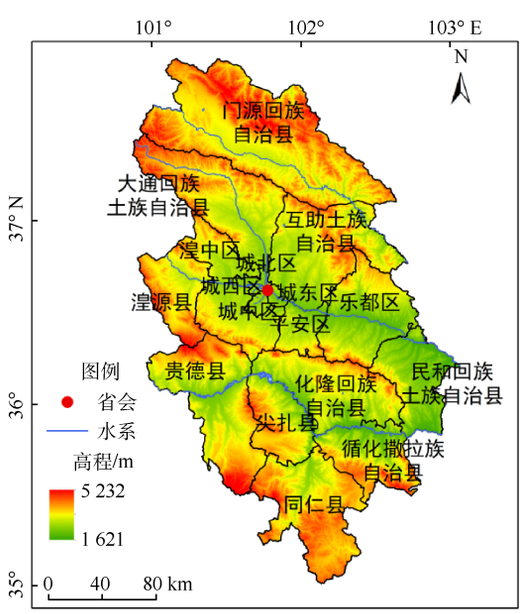


图1 河湟谷地研究区概况

河湟谷地处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交绥地区,是由黄河及其支流冲积而成的高原河谷,黄河与湟水交汇,是中国3大水能富集区之一[21-22],集中了青海省60.0%的耕地[23],是黄河流域人类活动最早的地区之一。产业以农业和工业为主,其中西宁

市的工业生产总值占据河湟谷地经济的主体地位[22],有72.8%的青海人口生活在此[23]。河湟谷地文物古迹众多,宗教胜地林立,多民族繁衍生息、交融共生,是一条沧桑变幻、流光溢彩的文化艺术长廊,有浓郁的地方和民族特色。在长期的历史交流融合发展中,河湟谷地多民族交错分布,历史文化绚烂绽放,形成了兼收并蓄、和谐共生的河湟文化。

2　数据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青海省河湟谷地地名为研究对象,地名来源于"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https://dmfw.mca.gov.cn),收集了河湟谷地西宁市、海东市、黄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5个市(州),17个县区一级地名,215个乡镇、街道、园区一级地名,3 107个村和社区一级地名;水系数据、30 m分辨率DEM高程数据来自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www.gscloud.cn)。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用分类统计方法,对河湟谷地地名进行分类统计和文本分析,将河湟谷地各地名的矢量数据进行核密度分析和标准差椭圆分析,进而研究该地区地名文化的分布特征。

(1)核密度分析。核密度分析是将已知的数据点作为中心,将落入搜索区域的点赋予不同的权重,也就是根据距离衰减规律研究区域的密度变化,计算结果分布较为平滑。利用核密度函数计算可以清晰反映出研究区域要素在空间上的分布及集聚特征,计算公式为[24-26]

$$f_n(x)=\frac{1}{nh}\sum_{i=1}^{n}k\left(\frac{x-x_i}{h}\right), \tag{1}$$

式中:$f_n(x)$为核密度值;k为核函数(非负,积分为1,符合概率密度性质,并且均值为0);i为样本点;n为样本总数量;h为检索范围的半径(称作带宽bandwidth);$x-x_i$为栅格中心点x到任意样本点x_i的距离。

(2)标准差椭圆。标准差椭圆是Lefever[27]在1926年提出的以中心、长轴、短轴、方位角为基本参数的空间分布椭圆,利用标准差椭圆法可以分析离散数据集的空间分布特征[28-31]。椭圆中心点表示整个数据的中心位置,长半轴表示数据分布的方向,短半轴表示数据分布的范围,长短半轴的差值越大(扁率越大)[28],表示数据的方向性越明显,反之如果长短半轴越接近,表示方向性越不明显。

3　地名分类统计及空间分布特征

3.1　河湟谷地村名统计分类

地名的命名,并非随心所欲的产物,在其生命的起点上,就被深深打上了出生地的自然和文化的胎记[32]。根据河湟谷地村落地名的用词以及其所反映的景观特征等,本文将地名分为自然景观类、人文景观类和其他类3个类别,又将自然景观类地名分为地形地貌类、动植物类和水文类3个亚类,人文景观类地名分为语言类、军事历史类、交通经济类、姓氏类、寓托类(寄托之意)和建筑类6个亚类,具体划分结果如表1所示。自然景观类地名在河湟谷地地名中比例为29.2%,人文景观类地名的比例为69.7%,其他类地名主要包括无明确意义和数量极少的分类,比例为1.1%。

对于复合类地名,如既有地形地貌又有方位或既有姓氏又含有方位的地名,因方位本身不构成单独的地名,依附于地形地貌、姓氏而存在,因此,本文将该复合类地名归属于地形地貌类和姓氏类;对少数民族语言类地名,不再按照翻译之意判别其类别,将其归属于语言类地名。对于地名的重复用字问题,在自然景观类地名中,地形地貌类地名和水文类地名的主要用字都有湾和滩字,湾意为河水弯曲处属于水文类,意为山湾则属于地形地貌类;滩意为河海边淤积成的平地或水中的沙洲时属于水文类,意为沿岩石或陡峭处形成的狭长沉积带则属于地形地貌类。而在文化景观类地名中,军事历史类地名和建筑类地名都含有堡和城,堡意为军事上防守用的建筑物,城意为用作防守的墙垣时属于军事历史类,否则属于建筑类。

3.1.1　自然景观类

在河湟谷地的自然景观类地名中,地形地貌类地名数量最多,共652个,占所有地名的21.0%,水文类地名和动植物类地名次之,占4.1%。地形地貌类地名主要以沟、山、湾、台和滩等用字为主,以沟字出现得最多,反映出河湟谷地复杂多样的地势结构。动植物类村落以当地常见的动植物名称命名,其中含有马、牛、羊等家养动物及狼、虎、熊等野生动物的地名仅38个,植物类地名较多,共计90个,符合河湟谷地农牧交绥的地理环境特点。水文类地名共计128个,主要以河、泉、水、湾和滩等字为主,以河湖等源头、尾闾以及河流的流向等分类。总体来看,在自然景观类地名中,地形地貌类地名

表1 河湟谷地地名分类统计表

类别	亚类	主要用字(词)	示例	数量	百分比%	类别百分比%
自然景观类	地形地貌类	沟、山、湾、台、滩、崖、岭、坡、坪、峡	甘沟门村、峨头山村、红土湾村、六台村、尧滩村、高红崖村、条岭村、斗斗坡村、双坪村、峡口村	652	21.0	29.2
	动植物类	树、草、柳、桦、马、羊、牛、虎	柏树堂村、草原村、柳树庄村、桦林庄村、马场村、马莲滩村、羊盖滩村、虎林村	128	4.1	
	水文类	河、泉、水、湾、滩	响河村、新泉村、白水村泉、泉尔湾村、河滩村	128	4.1	
人文景观类	语言类	藏语、蒙古语、土语、撒拉语、方言	塔哇村、胡思洞村、好来村、米牙亥村、吧浪村	854	27.5	69.7
	军事历史类	营、堡、城、屯	营盘村、王斌堡村、山城村、王屯村	424	13.7	
	交通经济类	街、巷、园、路、道、铺、店	后街村、东门巷村、南园村、大路村、巷道村、甘里铺村、七里店村	259	8.3	
	姓氏类	李、王、马、杨、刘、陶、张、沈	李九村、王家庄村、马家村、杨家寨村、刘家寨村、陶新村、张家庄村、沈家寨村	223	7.2	
	寓托类	团结、丰、安、宁、永	团结村、丰胜村、安定村、长宁村、永进村	212	6.8	
	建筑类	寺、城、堡、窑、桥、庙	丹麻寺村、三角城村、向阳堡村、窑洞村、土桥村、双庙村	194	6.2	
其他类	—	—	里长村、全都村、回民三队村	33	1.1	1.1

注:—表示无数据。

所占比例最大,可见相比较于水,地形地貌要素对于人类定居决策的影响更大。

3.1.2 人文景观类

河湟谷地的语言类地名囊括了藏、蒙、土、撒拉等多个民族的语言文化,统计有854个,其中土族、撒拉族为青海独有。军事历史类地名共计424个,占所有地名的13.7%,且多以军队驻扎、历史搬迁、战争和粮草囤积等命名。交通经济类地名共计259个,以街、巷、园、路等命名。姓氏类村落地名共计223个,包含了123个姓氏,多数以村落中人数居多的姓氏命名,也有以村里某位著名人物的姓氏命名。寓托类地名占6.8%,浓缩了历代人对于生活的期盼及未来的寄托。建筑类地名主要以寺、城、堡、窑、桥、庙宇等当地最突出或曾经突出的建筑命名,共194个。总体来看,69.7%的人文景观类地名都浸含着河湟谷地的人文历史积淀,展现出青海河湟谷地悠久的人类活动历史和多元的民族文化。

3.2 村落地名景观空间分布特征

本研究依托河湟谷地地名文化景观分类(表1),利用ArcGIS的核密度分析和标准差椭圆对河湟谷地的地名进行分析,绘制出河湟谷地地名空间核密度、标准差椭圆,见图2。

在总体分布上,河湟谷地的村落主要集中于西宁的城东、城西、城北和城中区,核密度值高达0.89,在西宁市城区的周围以及各县区(除门源县、尖扎县、同仁县外)形成一个次密集区,见图2(a),密集程度呈现由西宁市区为中心向东南方向延伸的趋势,东南、东北、西北、西南各方向的分布差异较大,各个集聚区之间呈总体上连续、局部隔离的状态分布。自然景观类地名形成了湟中区、民和县、门源县3个密集区,见图2(b),并向外延伸形成大通县、互助县等次密集区,其与湟水的分布基本相符,椭圆扁率较大,具有一定的方向性。人文景观类地名的分布以西宁城东、城西、城北和城中区为密集区域,核密度值高达0.791,分布的方向性不明显,在各县呈现连续的散落分布,见图2(c)。

总体来看,地名整体分布于河湟谷地的中部,见图2(d),呈西北-东南方向,并有沿水系分布的特点,在黄河、湟水、大通河的干、支流中,沿黄河上游支流湟水分布最为密集。其中:自然景观类地名分布的方向性较强,与湟水分布最为吻合;文化景观类地名分布的方向性较弱。

3.2.1 自然景观类地名分布特征

自然景观类地名核密度分析见图3。河湟谷地作为高原河谷,地势复杂多样,与地形地貌有关的地名很多。由图3(a)可知,地形地貌类地名聚集的地区主要是湟中区南部、民和县、大通县南部、乐都区、互助县西部以及县区的边界处。湟中区、乐都区、民和县存在多处聚集地,核密度值较高。

河湟谷地自然资源丰富,存在很多以动物和植物命名的地名,可以反映出历史上动物繁衍生息、植被覆盖的活动状况。由图3(b)可知,动植物类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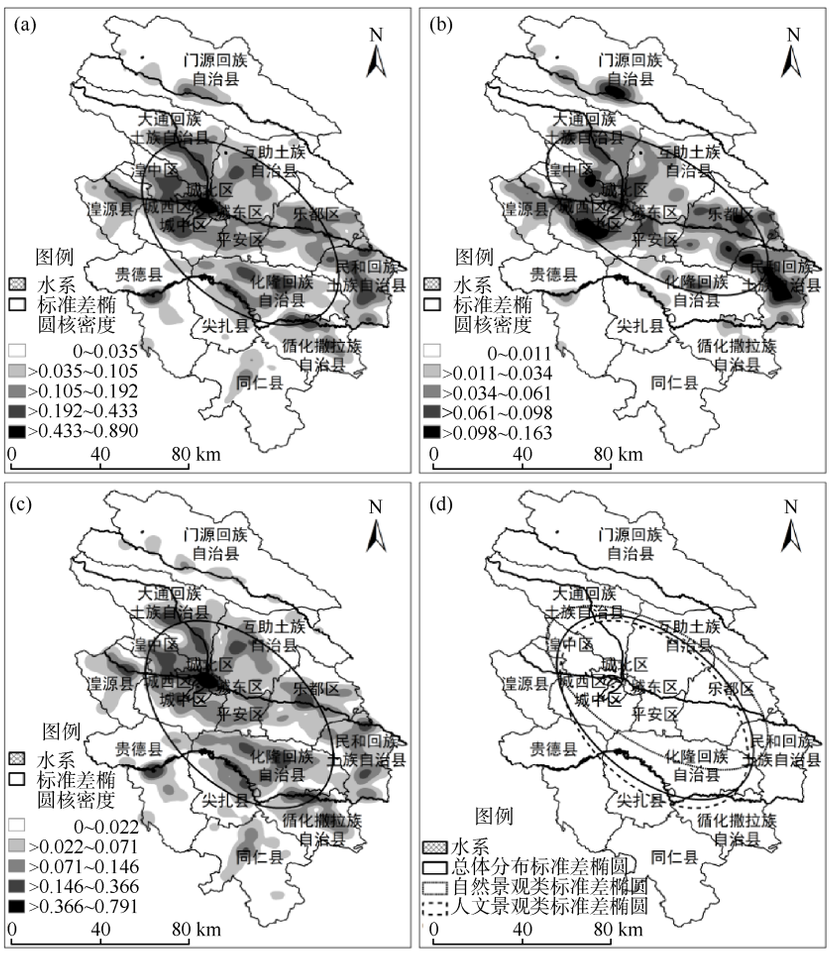


图2　河湟谷地村落地名景观核密度分布

(a)总体分布;(b)自然景观类;(c)人文景观类;(d)标准差椭圆对比

名多零散分布在西宁市城北区、湟中区、大通县、门源县、湟源县和平安区等地,标准差椭圆的离散程度较大,方向性较弱。

河湟谷地作为黄河及其支流冲刷出来的谷地,常以河、泉、水等命名。由图3(c)可知,水文类村落的主要聚集在湟中区,在西宁市区、门源县、民和县、乐都区、湟源县、大通县依次存在较小的次聚集区,聚集比较分散,村落方向与湟水分布相接近,在黄河和大通河附近,核密度值较低。

3.2.2　人文景观类地名分布特征

河湟谷地人文景观类地名核密度分析见图4。河湟谷地作为多民族聚居地,囊括了多个民族的语言文化,其语言类地名的密集区分布广泛。由图4(a)可知,多分布在河湟谷地的南部,如循化县、化隆县、尖扎县、湟源县、湟中区、贵德县等地为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尤其是化隆县存在多个密集区,地名分布点的平均中心也位于化隆县。

特殊的地理位置、复杂的历史环境,造就了河湟谷地丰富的军事历史类地名。由图4(b)可知,军事历史类地名主要分布在西宁市5个区和大通县,在化隆县、贵德县和乐都区呈现次密集区,密集区大多分布于水系附近,标准差椭圆离散程度较大,方向性较弱。

交通和经济会推动地方的发展,古人以交通、经济给地方命名,对今日了解当时的交通发展、经济活动有重要的作用,河湟谷地的交通经济类地名密集分布在西宁的城东、城北、城西和城中区。由图4(c)可知,其核密度值最高值位于西宁4个城区交界处,为0.427,其余次密集区零散分布在各县,标准差椭圆方向性微弱。

中国自古就是氏族社会,血缘是联系人际关系的纽带,往往同族同姓氏聚在一起,组合成村落,河湟谷地的村落名称大多以宗族姓氏命名,少数以著名人物姓氏命名。由图4(d)可知,姓氏类地名以西宁市区、大通县、乐都区、民和县为密集区,密集区都围绕湟水分布,具有一定的方向性,在其余县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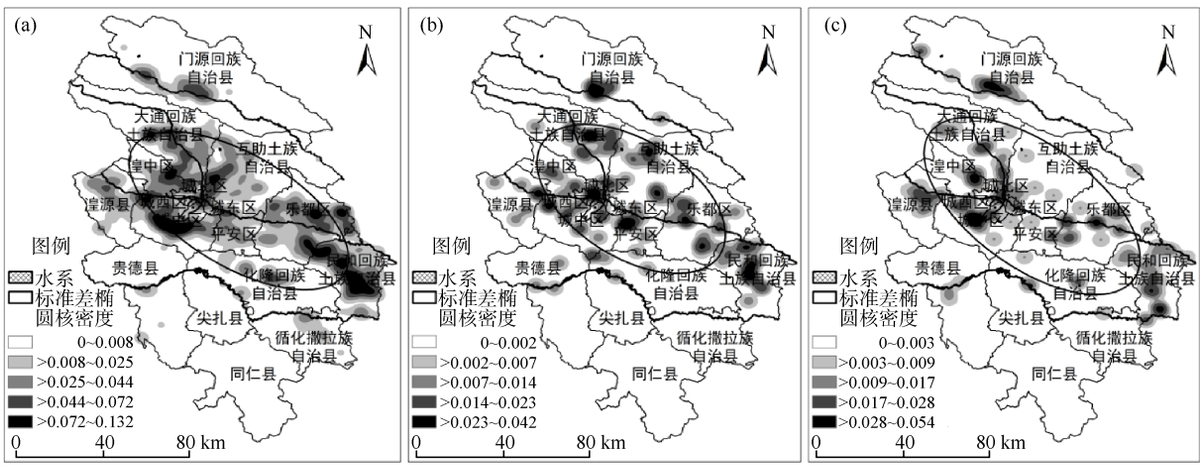


图3　自然景观各个亚类地名核密度分布

(a)地形地貌类;(b)动植物类;(c)水文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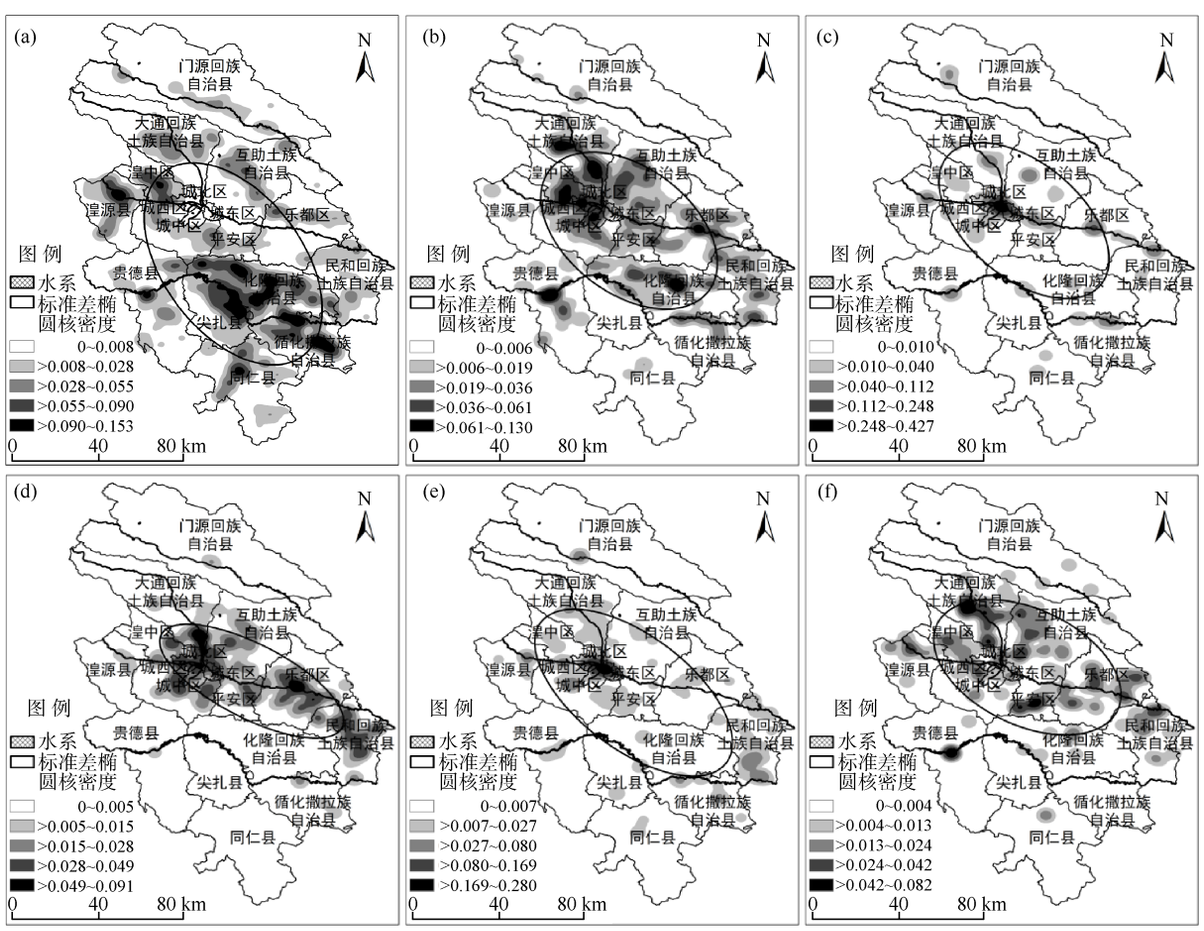


图4　人文景观各个亚类地名核密度分布

(a)语言类;(b)军事历史类;(c)交通经济类;(d)姓氏类;(e)寓托类;(f)建筑类

只存在零星低密集区。

河湟谷地地处军事要地,战争频繁,人们惯常把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寄托在地名上,形成了寓托类地名。由图4(e)可知,寓托类地名在西宁市区分布密集,在其他地区呈现低密度的零散分布。

建筑是工程与艺术的结晶,在一定程度上是地方的标志。由图4(f)可知,建筑类地名整个呈团状分散在大通县、平安区、贵德县、互助县等地,其标准差椭圆中心位于互助县西南部,与其他几类中心位于平安区的地名存在差异。

4　村落地名空间分布特征成因

文化是自然环境的产物,自然环境是文化的载体和媒介[33],地名是人类在不同时代与自然斗争和人类交往的产物[34]。河湟谷地山川相间,地貌奇特,各类地名也折射出自然环境粗犷、朴直的特色[35],以文化的视角投射出工、农、商、学和兵等社会群体,以及宗教文化、民居文化、民俗文化在河湟谷地历史沿革中发挥的作用和占有的位置[36]。其总体分布随着时间的推移由西宁向周围地区辐散,究其成因,主要有如下2个方面:一为自然原因,西宁位于湟水河中游的河谷盆地,气候温和,水分较充足,适合发展农业,是黄河流域早期人类耕种文明发祥地;二为军事历史原因,《读史方舆纪要》[37]中记载:“西宁,万山环抱,三峡重围,红崖峙左,青海潴右,扼束羌戎,屹为襟要,汉武使霍去病破匈奴,因斥逐诸羌,不使居湟中”。因此,汉唐时期,毗邻渭河上游的西宁就成为派兵驻守的重要防线,扼守乌鞘岭,保障河西走廊的安全。

4.1　自然景观类地名分布特征成因

自然景观类地名受地形地貌和水文影响较大,方向性较强,大多分布在沟谷、山脚部位,沿黄河、湟水、大通河等水系,其地名分布的方向与湟水西北向东南延伸的“树枝状”水系分布特征较为吻合,反映出当地错综复杂的区域自然地理环境特征。山水赋予了世代各族人民以勤劳勇敢、纯朴高尚的品格,在漫长的岁月里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历史和文化,展现出河湟谷地多山少水、山高沟深的自然地理特征和依山傍水、占山守水的村落分布特征。例如,湟中区、乐都区等分布的多条湟水河支流发育了较大的谷地,水文条件优越,适合耕种,形成了高密度区;民和县位于黄河、湟水河的交汇处,气候适宜,山峦重叠,面积广阔的黄土塬和黄河、湟水谷地造就了多样化的自然景观地名。整个自然景观类地名为河湟谷地成为历代战略要地以及多民族、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奠定了自然基础。

地形地貌类地名的分布与地质特点、地势、海拔息息相关,集中分布在湟中区南部、民和县、大通县南部等地,大部分村落分布在地势较平坦、海拔较低、适宜居住的沟谷、山脚边。例如:红崖沟村,分布在多红土、多土崖、多山沟处;中咀山村位于2个山沟之间;簸箕湾、铧尖、烂泥滩等都由该村的山体形状特征而得名。

动植物类地名主要分布在海拔较低、生物资源丰富的地区。这些地名是拓荒者们对于河湟谷地地域景观的深刻印象,并在其地名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动植物往往作为参照物和标志,担当起居住点间联络的信号。而今,昔为牧地的马场、羊圈、人迹罕见的老虎沟、狼沟等,早已辟为农田、聚落,但地名作为历史的记忆沿用至今。

水文类村落的聚集区都临近湟水或以湟水为中心,这和黄河和湟水支流众多、相间分布密切相关,也离不开人类繁衍生息、逐水草而居的自然选择,而相较于黄河沿岸,湟水的山势更为平缓,因此其核密度值高于黄河和大通河附近。

4.2　人文景观类地名分布特征成因

人文景观类地名是政治、文化、交通经济、军事历史等的具体反映,主要分布在省会西宁市区及周边的地区,从中可以窥见先辈筚路蓝缕、含辛茹苦的奋斗历史。同时,随着史事变迁,与时俱进,呈现出地名文化的社会性和时代性。其中,西宁军事历史悠久、人文底蕴深厚,作为“古丝绸之路”的南线及“唐蕃古道”上的枢纽,是各民族互通往来、通商贸易、文明交流的交汇点,使得整个人文景观类地名呈现出以西宁市为中心小范围密集、大范围稀疏的特点。语言、军事历史类地名沿黄河的分布密度较高,这与黄河是我国的母亲河,比湟水历史渊源更为深厚有关。

语言类地名中,西宁市核密度值呈现低于周围地区的低值区域,因青海省民族分布较多分布与周边地区;化隆县、循化县、尖扎县由于少数民族较多,呈现异于其他分类的聚集分布。费孝通[38]称这种保持民族语言、习俗的族群聚居地为“民族小岛”,在这种小聚居的生存格局下,既保持相对的独立性格,又有文化共生的特点,符合河湟谷地多民族杂居共处的独特样态,展现其包容多元一体的风采。

军事历史类地名主要分布在西宁市区和大通县:(1)由于2个地域历史悠久,秦汉以前,就有匈奴在此居住,在汉武帝时期,霍去病就在西宁修建西平亭,设兵驻防,在大通县修城堡、屯垦,补足军需[39],如塘马坊村、佐署村,皆得名于旧时官署机构;(2)西宁较多战事,为自卫计,大多建起营、城、堡、寨等,星罗棋布分布于西宁市周边,共同构成了较为完备的军事防御体系[35],如老营庄村和二连村,分别是古军队安营扎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驻扎;(3)史载“陇右西平之地,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富庶者,无如陇右”[40],西汉在今西宁设立

了西平亭,其地形卓越、土壤肥沃、物资富饶,吸引了一批批移民,凉州庄村与河州庄村等皆是逃荒者取原籍名建庄,把故土的愁思扎根在新的土地上,保留着原本的生活印记,使得乡愁根植于每个国人血脉里,成为反哺家乡的文化基因。

交通经济类地名密集分布在交通运输发达的西宁,是连接青藏高原的交通枢纽,与全省、全国、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具有重要的交通战略意义。其地名体现了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新时代特点,如西宁城北区的萨尔斯堡社区和美丽水街社区、城西区的海湖广场社区等,揭示了原村落消失及新聚点涌现的事实[41]。

以姓氏命名的村落大多是汉族聚居的村落,极少数是以少数民族姓氏命名,反映出典型的汉族文化及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差异,呈现民族融合发展的新姿态。西宁市周边的姓氏类地名,以最早开发该地家族的姓命名的最多,如罗家、张家、李家等,而随着时间的变迁,以望族命名的村庄,早已被其他姓氏占据[35]。可以说,地名在日常生活中受民众力量影响,成为民众塑造集体记忆和维持地方依恋的重要载体[42]。

寓托类地名在西宁市区分布密集,因汉代起西宁就是军事要地,经历了长久的战争纷扰,又作为民族融合的中心,对和平幸福生活的需求更为迫切、强烈。以团结命名的村落有10个,在不同地区寄托着相似的寓意;解放、红星和八一等更是带有着民族复兴的时代特色和中华民族血与泪的历史记忆,使慷慨激昂的热血永远流淌于民族的动脉。

建筑类地名呈团状分散在少数民族多的大通县和平安区等地,这些地区有宗教性建筑,这类建筑往往承担着地标的作用,有宗教信仰的民众对其满含骄傲与期待,拥有较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研究显示,许多曾经规模宏大的民族、部落经过朝代更替,相继消失,很多古代民族语地名淹没在后来的地名之中,踪迹难觅。“民族小岛”除了存在于青藏高原、新疆、内蒙古、宁夏几大少数民族自治区,其他大多在较低层级的县、村中。河湟谷地村落地名的世代相传,代表着“民族小岛”中最古老、最凝重、最感人的部分的保留。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县、村的地名中产生了一地多名、名实不符、不雅地名等问题,尤其一些具有历史见证与人文影响力的村落,仅留有部分残垣断壁,直接影响到了地名的消逝、调整、更新。如何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地名,保护、利用并挖掘地名文化价值,深入了解地名饱含着的乡愁、历史、文化,树立起文化自信的基石,有待今后的进一步探索。

5 结 论

本文通过分类统计法、核密度分析和标准差椭圆对河湟谷地村落地名进行分类、分析其空间特征和成因,得到如下结论:(1)河湟谷地的村落地名可以分为自然景观类、人文景观类和其他类3个大类。69.7%的地名属于人文景观类地名,反映了青海河湟谷地悠久的人类活动历史和多元的民族文化,复合类地名展现出民族语言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包容性。(2)河湟谷地地名密度呈现以西宁市为中心沿湟水、黄河、大通河等水系向四周辐散降低的方向性趋势,聚集区符合小范围连续、大范围间断的“民族小岛”生存格局。(3)自然景观类地名充分展现了河湟谷地依山傍水的村落分布特征,体现了河湟谷地先民们趋利避害、向水而居的自然选择,折射出自然环境粗犷、朴直的特色;人文景观类地名体现了河湟谷地多民族融合发展,同时也反映了其地处边地要塞,受战争影响深远的史实,映射出先民们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

地名可以沉淀情感,确立文化认同感,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很多村落都将面临现代化改造,地名也在改造的范围之列,在这个过程中,地名规划要紧紧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二十大报告“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地名管理条例》(2022版)为依据,加强和规范地名管理,探究地名源流,深入挖掘地名背后的文化、历史等,书写地名文化的新篇章,使得地名文化的繁茂历久弥新。本研究以自然景观类地名为骨架,人文景观类地名为血脉,探索和研究河湟谷地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原因,有利于深入挖掘青海的历史、文化地理,为多民族融合发展、人口迁移等提供史实依据,让民族文化基因与新时代相协调,为提高地方文化软实力奠定基础。

参 考 文 献

[1] YEOH B. Street-naming and nation-building: toponymic inscriptions of nationhood in Singapore[J]. Area, 1996, 28(3): 298-307.

[2] JETT S C. Place-naming, environment, and perception among the Canyon de Chelly Navajo of arizona[J].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1997, 49(4): 481-493.

[3] CAPRA G F, GANGE A, FILZMOSER P, et al.

Combining place names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on soil resources through an integrated ethnopedological approach[J]. Catena, 2016, 142(3): 89-101.
[4] CAVALLARO F, CACCIAFOCO F P, TAN Z X. Sequent occupance and toponymy in Singapore: the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development of urban place names[J]. Urban Science, 2019, 3(3): 98.
[5] GILL G. Changing symbols: the renovation of Moscow place names[J]. The Russian Review, 2005, 64(3): 480-503.
[6] NADEZHDA M, THOMAS T F. The multiperspectival nature of place names: Ewenki mobility, river naming, and relationships with animals, spirits, and landscapes [J].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2022, 28(3): 875-895.
[7] 张俊玲，乔诗尧.地名文化景观的研究进展[J].绿色科技，2022，24(7)：143-146.
[8] 王彬，岳辉. GIS支持的广东地名景观EOF模型分析[J].地理科学，2007(2)：281-288.
[9] 王彬，司徒尚纪.基于GIS的广东地名景观分析[J].地理研究，2007(2)：238-248.
[10] 陈晨，修春亮，陈伟，等.基于GIS的北京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成因[J].地理科学，2014，34(4)：420-429.
[11] 王法辉，王冠雄，李小娟.广西壮语地名分布与演化的GIS分析[J].地理研究，2013，32(3)：487-496.
[12] 路娜，曾佩枫，张海平，等.天津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形成机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2，36(2)：194-201.
[13] 朱竑，周军，王彬.城市演进视角下的地名文化景观：以广州市荔湾区为例[J].地理研究，2009，28(3)：829-837.
[14] 史晴，赵寰熹.基于地名体系的区域空间格局研究：以北京房山区为例[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42(3)：37-43+51.
[15] 王涛，李君，陈长瑶，等.高原湖泊平坝区乡村“涉水”地名文化景观分析：以环滇池地区为例[J].经济地理，2020，40(12)：231-239.
[16] 周璟，王盼，王宏卫，等.阿克苏河流域地名文化景观分布特征及成因探析[J].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3，45(1)：159-172.
[17] 李巍，杨斌.藏族村落地名的空间格局、生成机制与保护策略：以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为例[J].地理研究，2019，38(4)：784-793.
[18] 陈优良，朱倩.客家聚落地名时空分布与演变方法研究[J].测绘科学，2021，46(2)：178-185.
[19] 李旻泽.青海河湟谷地传统民居地域性研究[D].西安：长安大学，2016.
[20] 程玉卓，赵文婷，焦菊英，等.河湟谷地近20年耕地利用变化的土壤保持效应[J].中国水土保持科学(中英文)，2023，21(1)：55-63.
[21] 李好好，黄懿梅，郭威，等.河湟谷地不同时空尺度下土地利用及空间格局对水质的影响[J].环境科学，2022，43(8)：4042-4053.
[22] 孙晓晨，焦菊英，王红雷，等.河湟谷地1980—2020年土地利用变化及其冷热点分布[J].水土保持通报，2022，42(1)：327-334.
[23] 青海省统计局.青海统计年鉴2016[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
[24] 王法辉.基于GIS的数量方法与应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5] 曲畅，任玉环，刘亚岚，等. POI辅助下的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城市建筑物功能分类研究[J].地球信息科学学报，2017，19(6)：831-837.
[26] 王鹤超，徐浩.基于POI及核密度分析的上海城乡交错带分布研究[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农业科学版)，2019，37(1)：1-5+18.
[27] LEFEVER D W. Measuring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by means of the 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26, 32(1): 88-94.
[28] 赵璐，赵作权.基于特征椭圆的中国经济空间分异研究[J].地理科学，2014，34(8)：979-986.
[29] 赵作权.地理空间分布整体统计研究进展[J].地理科学进展，2009，28(1)：1-8.
[30] FISCHER M M, GETIS A. Handbook of applied spatial analysis: software tool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M]. Berin: Springer, 2009.
[31] 商馨莹.基于标准差椭圆法分析农村居民点分布特征：以淮南市潘集区为例[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8，29(9)：244-246.
[32] 刘成.地名的文化信息：以盐城地名和海盐文化为例[J].盐业史研究，2012(2)：39-43.
[33] 王彬，黄秀莲，司徒尚纪.广东地名语言文化空间结构及景观特征分析[J].人文地理，2012，27(1)：39-44.
[34] 华林甫.中国地名学源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35] 靳育德.老西宁贰[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4.
[36] 靳育德.老西宁[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2.
[37]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
[38] 费孝通.乡土中国[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9] 包正礼.青海湟水流域历史文化追忆之四 大通篇(上)[J].群文天地，2011(7)：15-29.
[40]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41] 李鹏，封丹.地名变迁中的文化政治阐释：以从化温泉为例[J].人文地理，2015，30(2)：58-64.
[42] 陈晨，程林.关中平原历史地名演变中的文化政治格局：基于批判地名学的研究[J].人文地理，2020，35(6)：50-56+84.

(责任编辑：李拓宇)